

# 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

蔡盛琦

## 摘要

石版印刷在清道光年間，透過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真正開始大量運用是在光緒年間。當時的《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創設了「點石齋石印書局」，因運用石版印刷術印製圖書、畫報，製版容易，大大降低過去製作雕版所費的時間及成本，故獲益甚豐；其他同業遂紛紛仿效設立新式書局，在當時蔚成一股風潮。本文則探討在此變動時代中的關鍵出版社——點石齋石印書局，它在整個中國近代出版業史來說，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

本文以出版史角度來看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兼論當時石版印刷的發展情形，先從清末石版印刷術傳入的時間及石版印刷的方法開始敘述；然後說明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立；再逐一探討其出版品的種類、銷售方式等；最後則因科舉時代的結束，新式印刷技術的引進，導致石印術的沒落，未能跟上時代的石印書局隨之結束，點石齋石印書局也從此走入歷史，結束了三十多年的風光歲月。最後則論點石齋石印書局對當時文化出版之影響，一是讓許多古籍藉著石印出版得以整理流傳下來；二是圖書出版品得以普及化；三是間接促使了出版業的蓬勃發展。

**關鍵詞：**石印本、印書局、石版印刷術、出版史、美查

# The History of Tienshihchai Photolithographic Publishing Works

Tsai Sheng-Chi

## Abstract

Photolithography was imported to China at the period of Tao-Kuang in the Ching Dynasty through missionary. At the period of Kuang-Hsu, it became a popular publishing ways.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 Which was founded by Mr. Ernest Major , made a big profits, because of they use photolithography to publish books and pictorial magazines. Photolithography can reduce a lots of time and cost. The Other publishing works fellow the example of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to setup the new style press.

This article study about the key publishing house '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 its influence of the publications at that time.Begin with the timing of photolithography imported to China and how photolithography works. Then step by step describe the setup of '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the categorys of its prelications, its marketing methods, because of the e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import of new technical about publishing to cause the decline of photolithography, finally,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this 30 years books store closed .But its influence of the publications at that time will last forever. First of them is to let paleography can be arranged, second is to popularize the publications, thired is to rising and flourishing the publishing houses.This artical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s to view the start and decling of Tienshinchai Photolithography Publishing Works and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lithography at that time.

**Key words:**Photolighographic printing edition, Publication, Photo-lithography printing technique, Publisher-History, Ernest Major

# 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

蔡盛琦\*

## 壹、前言

晚清時的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不只是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就連圖書出版文化，也經歷了一次大變革。在這一時期，各種外國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著作被大量地介紹進了中國，圖書內容上產生了新思維、新的學科架構；出版形式上，報紙、雜誌、教科書大量出現；圖書形態上，新的印刷技術取代了舊式的雕版印刷；圖書銷售上，傳統銷售體系逐漸式微，取而代之是新的商業銷售方式。這些變革，配合著當時的考試制度、學校教育制度、工業發展、社會結構而一起脈動，隨之也改變了藏書家、知識分子對圖書既有的認知與態度。本文即探討在此變動時代中應運而生的出版社——點石齋石印書局。

點石齋石印書局由英國人安納斯脫·美查（Ernest Major）所創設的，是當時上海《申報》館的附屬機構。它以運用石版印刷術印製圖書，因為製版容易，大大減少了過去製作雕版所費的時間及成本；迫使其他傳統書業也走向新式出版方式；而以新式印刷技術印製圖書的新書局也紛紛設立。它的成立改變了中國近代出版業，迫使近代出版業走向現代化，可謂開啟近代出版業的工業革命。

另一方面，該印書局利用新式印刷術快速翻印，將圖書商品化後，瓦解了過去傳統的思維，認為出版圖書是為保存文化，被賦予藝術文化的披袈，這也改變了讀書人、藏書家對圖書傳統的認知與收藏的態度。

本文在探討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立及興衰時，先從清末石版印刷術傳入的時間，及石版印刷的方法開始敘述；然後說明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立，再逐一論述其出版品的種類、銷售方式等；最後來看石印書局的沒落。本文純就出版史角度來看點石齋石印局的興衰，兼論當時石版印刷的發展情形，及該局對當時文化出版事業的影響及貢獻。

---

\* 國史館科員

## 貳、清末石版印刷術

中國傳統的出版印書，大致可分為官刻、家刻及坊刻三部分，官刻主要集中在內府刻印。康熙 12 年（西元 1673 年）在武英殿設立了專門的刻書機構，派翰林院詞臣管理，所刻的書稱為「殿本」。家刻亦稱私刻，盛行以精楷寫刻，當時有許多書均由名家精心繕寫刻印，形式精美，清代考據、校勘和輯佚學大興，一些學者和藏書家精於校勘，所刻書是清代雕版書籍中最有價值的。坊刻所刻書大多為民間所用的課本、日用雜誌、通俗小說、戲曲唱本等，翻刻古書，但精本不多。<sup>1</sup>而這些出版事業向來專恃木刻，其間雖有膠製活字、木製活字出現，但究以木刻為大宗。至於有插畫的印刷則以雕版印刷進行，雕版印刷必須畫家與刻工配合默契，方才可能創作出完美的圖像。<sup>2</sup>

後來新式印刷術的相繼傳入，出現了木刻雕版印刷與鉛印、石印並行局面。就當時的條件而論，木刻、鉛印適合文字的印刷；圖畫的印刷，以雕版石印技術印刷；銅版圖片只有國外才能代製。因傳統的木刻活字較費時費工，而鉛字印刷品質不一，受此侷限，相較之下原本適合印製圖畫的石版印刷，也開始翻印古籍，使得石版印刷對於清末的出版事業，確實起了一番變革。

以下則先談當時的石版印刷術：

### 一、石版印刷術傳入的時間

石印術是 1776 年德國施納飛爾特（Aloys Senefelder, 1771-1834）所發明。這種石版印刷法，本來是預備複印一些樂譜，但是日後竟演變成複製肖像畫、插圖或名畫等的簡便工具。<sup>3</sup>

至於這種簡便的石版印刷術究竟是何時傳入中國，有以下不同的說法：賀聖鼐和淨雨，他們認為最早開始以石版印刷教會宣傳物的是上海徐家匯天主堂附設的土山灣印刷所，主要是用來印宗教宣傳品，時間則是在光緒 2 年（西元 1876 年）。<sup>4</sup>這時間距德國施納飛爾特發

<sup>1</sup>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 44 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頁 482。

<sup>2</sup> 陳平原：〈以圖像為中心——關於《點石齋畫報》〉，《二十一世紀》，59 期（2000 年 6 月），頁 2。

<sup>3</sup> 卓聖格：〈吳友如及其時事新聞插畫研究〉，《臺中商專學報》，25 期（民國 83 年），頁 757-758。

<sup>4</sup> 賀聖鼐在〈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一文中引〈上海研究資料〉說：「吾國之有石印術，發軔於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刷所，時在光緒 2 年。」，收錄於《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9 年），原文載於 1931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在淨雨〈清代印刷史小紀〉中說：「中國之最早用石印術者，為上海徐家匯天主教之土山灣印書館，時在清光緒 2 年



明石版印刷剛好是一百年。

而張秀民則認為早在道光年間即有石版印刷術，在《中國印刷史》一書中認為，中國人第一個學會石印術的，是著名印工梁阿發的徒弟基督徒屈亞昂。他跟馬禮遜的長子馬儒翰學習石印術，常在澳門印刷許多一面經文、一面圖畫的佈道宣傳品。而馬禮遜在 1807 年來華，卒於 1834 年 8 月，據此可知屈亞昂學會石印是在道光 12 年（1832 年）左右。<sup>5</sup>比賀聖鼐的說法早了約四十四年。

而在蘇精〈中文石印〉一文中則更確定的說法是在道光年間，他指出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光緒年間，石印在中國盛極一時，但早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中，已有絡繹不絕的中文石印活動。」<sup>6</sup>因為西元 1826 年馬禮遜回到中國，同時攜來一部自費購買來的石印機，兩個月後的 11 月 14 日，中國的第一次石印在澳門進行，由馬禮遜的華人助手阿才執筆、他兒子馬儒翰印刷，他們合作的不是中國文字而是山水畫。<sup>7</sup>這是在中國最早的石印製品。

從以上說法來看，可以確定的是，在道光年間中國就已有石版印刷製品出現，但真正普遍運用盛極一時，當是在光緒年間。

## 二、石版印刷術的方法

石版印刷是平版印刷的一種，平版印刷是以天然多微孔的石版石來製版，用脂肪性的轉寫墨直接將圖文描繪在石版面上，或者通過轉寫紙轉印於石面，根據水油相拒原理，經過技術處理，製成印版，再嵌入機器印架中。印刷時，用水潤濕版面，只有圖文部分能附著油墨，使圖文部分著墨拒水，非圖文部分吸水抗墨。<sup>8</sup>這是利用水墨不相容的原理印刷。

石版印刷在土山灣印刷所最早階段是使用木製石印架，以人力攀轉，印刷異常費力，而製版是以轉寫墨直接描繪於石版上或轉寫紙上。後來則改進製版技術利用照相製版的方式，將許多舊籍以照相（影抄）方式快速製版，再以石印技術出版成書。在黃協埙《淞南夢影錄》中有說到「電鏡映像」的方法，即應是指此法：

---

（1876 年）間（按：該館設立石印印刷部在 1874 年，即清同治 13 年）石印書籍之始，則當推上海之點石齋石印書局。」，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頁 356。

<sup>5</sup>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579-580。

<sup>6</sup> 蘇精：〈中文石印（1825-1873）〉，《書目季刊》，29 卷 3 期（民國 84 年），頁 3。

<sup>7</sup> 蘇精：〈中文石印（1825-1873）〉，《書目季刊》，29 卷 3 期（民國 84 年），頁 4。

<sup>8</sup> 參考高俊茂編著：《美工廣告印刷概要》（臺北市：星狐出版社，民國 79 年），頁 15。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 年），頁 272。

石印書籍，用西國石板，磨平如鏡，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跡於石上，然後傳以膠水，刷以油墨，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細若牛毛，明如犀角，剗刷氏二子可不煩磨厲以須矣。<sup>9</sup>

「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跡於石上」，即是照相製版的方法。在《上海彝場景緻》〈石印書籍〉中也有說到此法：

印書之石，造自外洋，以照相法攝書下於石上，嵌入機器印架中印之。印時，石上常潑清水，則無字跡處墨油不污，法至善也。<sup>10</sup>

在1878年12月30日的《申報》有一段廣告：「本館近從外洋購取照相字畫新式機器一付，於點石齋中延請名師監印，凡字之波折、畫之皴染，皆與原本不爽毫釐。」可知此時的機器已是應用新的製版技術，而非早期的印製宗教圖畫以手繪圖於石版上的石印術。因它能「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照相製版的方式，可以節省許多手工製版的費時費工的成本，快速又節省時間，而且字體清晰，即使「細若牛毛，明如犀角」，也能清楚的印出，石版翻印古籍，應多是用此法製版，對於放大或縮小書籍原本也是輕而易舉，在徐潤的《徐愚齋自敘年譜》中稱讚石印與原書無毫髮差：

查石印書籍始於英商點石齋，用機器將原書攝影石上，字跡清晰，與原書無毫髮爽，縮小放大，悉隨人意，……。<sup>11</sup>

因此石印能於光緒年間盛行，與照相製版技術的應用有莫大的關係。

### 三、石印本的特色

在那個時期所出版的石印本書籍在紙張、墨色上有其特色，根據淡江大學吳麗雯所著的碩士論文〈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中對石印本的觀察，大約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sup>12</sup>

(一)用紙：多為有光紙或連史紙。<sup>13</sup>

<sup>9</sup> 〈申報書序〉，轉引自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89。

<sup>10</sup> 〈申報書序〉，轉引自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91。

<sup>11</sup> （清）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市：食貨出版社，民國66年），頁61。

<sup>12</sup>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淡江大學中文系民國86年碩士論文，頁70。

<sup>13</sup> 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之工業》，頁68：「市面通用紙張不計外，約可分為六類：（一）供毛筆書筆者，如國產宣紙、貢川、連史、毛邊等屬；（二）鋼筆、鉛筆書畫者，如二號紙、富士紙、繪圖紙等屬之；（三）供新式印刷者，如道林紙、模造紙、銅版紙、新聞紙、有光紙等屬之；（四）供包裝者，如牛皮紙、表古紙、

- (二)墨色：使用油墨，墨色極為均勻，看起來較為浮亮，烏黑而醒目。
- (三)以其為平版印刷，因此字與紙張之間並無壓印凹凸的痕跡，摸起來是平滑的。
- (四)早期專為科舉所需出版的石印書籍，行款細密，書型袖珍，字跡雖細若蠶絲，亦無不明同犀理，品質雖不甚佳，取其便於攜帶、價格便宜之用。
- (五)以石印翻印古籍，多採縮印的方式，喜將原版縮成較小的版面並列於同一頁，價格比起原本則便宜許多，攜帶也較為方便，但有些重要典籍，雖然縮印，品質仍頗佳。
- (六)石印通俗文學作品，一般品質較粗劣，書型非常袖珍，有的大約只如手掌大小般的尺寸，多有繪圖繡像，繩頭小字，價格極為低廉。
- (七)石印畫報或一般報刊，在版面及畫面上，整體而言，都要較當時鉛字排印的報刊來得清晰、整潔。

### 叁、點石齋印書局的興起

前面所說中國傳統的出版印書，大致分為官刻、家刻及坊刻三部分，但一旦新的思潮與進步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中國，原有官刻、家刻、坊刻的舊出版體系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於是政府開辦官書局、私坊刻書也進一步分化，新式印刷出版發行機構便應運而生。最初是一些外國傳教士和外國商人，後來才是本國商人，陸續開設新式印刷廠，採用新式印刷技術，創立出版和發行機構。<sup>14</sup>

出版與印刷分業，是近年社會分工的趨勢，在早期的出版業與印刷業，向來是界限不分的。像商務印書館雖名為「印書館」，但後來出版成了主業；中華書局雖是出版業，也兼印刷書籍；因此出版與印刷在早期是很難區別其業。通常印書館包含了圖書出版的業務，因此當時的印書館業務即包含現在出版社的工作。

而運用以石版印刷術印製書籍出版，是以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為最早。<sup>15</sup>點石齋石印書局是申報館的附屬機構，只是因為《申報》購置新式的印刷機器，而另成立點石齋石印書局，來專司出版圖書之事；因此它的設立有別於為傳播宗教的教會出版事業；也有別於傳播

薄面紙、手工製粗皮紙皆屬之；(五)有特別用途者如鈔票紙、照相紙……(六)各種紙版。」頁110：「其時中國連史紙質美價廉，亦石印發達之最大原因。」

<sup>14</sup>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44冊，頁483。

<sup>15</sup> 在淨雨〈清代印刷史小紀〉中說：「石印書籍之始，則當推上海之點石齋石印書局。」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頁357。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一章〈外國資

西方知識的官書局。

## 一、創辦人美查

前面已經說過點石齋石印書局是上海《申報》的附屬機構，他的創辦人一般咸認為是英人美查。英國人安納斯脫·美查和他的哥哥（Frederick Major）在清同治初年來上海。他們原先經營茶葉生意，因為虧損而想改經營其他生意，這時美查的買辦人陳華庚看到《上海新報》銷路好，建議美查辦中文報紙。於是在上海創辦了《申報》，並聘吳子讓為主筆。因為當時報紙經營的人少，很快的就開始有盈餘；於是利用印報紙的機器，多元化經營，開始印製圖書。繼而創辦了「點石齋石印書局」，並聘請土山灣印刷所邱子昂為石印技師。<sup>16</sup>因此他應是於1878年，<sup>17</sup>又開設石印局。它的業務主要是翻印書籍。許多已絕版的古書，和原來不是用活字版而是用木版刻印的書籍，都加以影印；還因為影印的成本低廉，所以也印了一些小部頭的書。用石印機印刷包括了經、史、子、集、中外輿圖、碑帖、畫譜、畫冊等。而他的哥哥仍經營茶葉生意。

1884年，正當中法戰爭開始的一年，美查為擴大《申報》之附屬事業，於5月創刊《點石齋畫報》，在當時，畫報上刊載過不少戰爭題材畫面，詳細的報導兩軍作戰的新聞畫，尤其那些勝利的捷報圖，更是吸引了數以千計的讀者。<sup>18</sup>

美查一向聘請中國人擔任編輯和經理，並按中國人的習慣安排《申報》的文字和版面，

---

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頁117中說：「石印書籍以上海點石齋印書局為最先。」

<sup>16</sup> 以上文參考《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一章〈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頁117中：「美查初與其兄弟販賣華茶，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後因所業失敗，思欲改圖。其買辦人陳華庚見上海報紙之暢銷，乃以辦報之說進，益介其同鄉吳子讓為主筆。美查贊同其議，乃延錢昕伯赴香港調查報業情形，以資倣效。時日報初興，競爭者少，其兄所營茶業亦大轉機，故美查歷年經營頗有所得，於是先後添設副業，點石齋書局即其一也。開辦之初，即聘土山灣印刷所之邱子昂為石印技師，最初印刷《聖諭詳解》一書。」另相關資料見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1957年），頁73-74。另在黃協塤：《淞南夢影錄》中亦說：「英人所點石齋，獨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1887年（光緒13年正月10月13日）《申報》：「石印書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贊嘆。」

<sup>17</sup> 點石齋創辦年代有不同的說法，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說是1879年：「中國最早用石印印書的出版機構。由英國商人美查1879年創辦於上海，……」，頁81。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一章〈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頁118：「1878年，美查兄弟公司開設了一個石印局。」。在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年），頁233中：「光緒4年（1878）美查創辦點石齋印書局翻印《康熙字典》、《聖諭詳解》等書，甚受文士歡迎，銷行極速。」在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學生書局，2000年），頁283：「申報館於1878年引進此法，翌年成立『點石齋』。」因申報曾於1879年刊出啟示：「本齋於去年在泰西購得新式石印機器一付，……」故以成立時間應是在1878至1879年之間。

<sup>18</sup> 參考卓聖格：〈吳友如及其時事新聞插畫研究〉，《臺中商專學報》，25期（民國83年），頁758。

他本人只作宏觀上決策，因而把《申報》辦得有聲有色，使其成為晚清最有影響的報紙。<sup>19</sup>他本人能說流利的華語，非常重視中國書籍形制及語言文字，不只是取中文名字也另起閣名別號，如「尊聞閣主人」是用於《點石齋畫報》主人時的署名之用，而且使用中國印信，十足華化。他引用中國文士，不注重其出身，只借重真才實學，所聘用主筆政的人，如蔣芷湘、錢昕伯、黃協埴都是博雅能文之人，他們也在美查的信任下充分展現自己的文采。<sup>20</sup>

到了1888年，《申報》已發展成當時影響最大、歷史最悠久、銷數最多的報紙，也是官民們重要的日常讀物。在這個時候，美查兄弟倆已入老境，想起了久離祖國的家鄉，決定回國安度晚年，便將他所經營的事業，改組成為「美查有限公司」。該公司包括：江蘇藥水廠、燧昌火柴廠、申昌書局及申報館等，全部資金三十萬兩，同時招收外股。美查兄弟倆收回本利後就在1889年回國。從此未過問《申報》之事。1908年，美查年逾七十，在英國家鄉病故。<sup>21</sup>

自1889年美查回國後，公司由董事四人管理，三位外國人，一位是中國籍的梁金池；到1909年，將《申報》館企業則全部出售與席子佩。此時的點石齋石印書局亦隨著《申報》企業，正式由國人接管。但是席子佩僅接手了幾年，於1912年又轉給以蘇路借款起家的史量才。<sup>22</sup>

## 二、設立經過

因為鉛印和石印等西方現代印刷術的傳入，在清末出現了雕版、鉛印、石印並行的局面。其中鉛印和石印都是機械化印刷，成本低、出書快、印刷量高，這就大大地促進了圖書事業的發展，使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印刷業呈現了空前的繁榮局面。<sup>23</sup>

申報館最初是以鉛活字印製報紙，並已多角化經營，有圖書的出版，但當時是以鉛活字排印書籍，在印刷報紙之餘，利用原有的機器設備印製出版圖書販售。出版了一系列的《袖珍叢書》，其印書數量可以與武英殿殿本書相媲美。<sup>24</sup>

<sup>19</sup> 張憲文：《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3。

<sup>20</sup> 參考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年），頁273-274。

<sup>21</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4月），頁19。

<sup>22</sup> 胡慈珠：〈史量才與上海申報（二）〉，《傳記文學》，第65卷第5期（民國84年11月），頁119中說史量才仲介對日秘密借款三百萬兩銀子以蘇路鐵路為抵押品，因借款成功，史量才獨得五厘佣金的介紹費，計十五萬兩銀子，從此發跡，由無產階級，一躍為有產階級，受盤《申報》。

<sup>23</sup> 參考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85年），頁342。

<sup>24</sup> 在胡道靜著《新聞史上的新時代》一書中介紹《聚珍版叢書》說：「申報翻印舊書和刊行新著，以鉛活

後來《申報》購置新式石印機器，在西元 1879 年 8 月的《申報》〈購置石印機器啟事〉中有：

本齋於去年在泰西購得新式石印機器一付，照印各式書畫，皆能與原本不爽鎔銖，且神態更覺煥發。至照成縮本，尤極精工，且行列井然，不費目力，誠天地間有數之奇事也。

由這啟事中可見當時已成立點石齋石印書局（初名點石齋書畫室），之所以名為點石齋，有冀望「點石成金」之意。所以點石齋石印局亦為申報館的附屬機構，以石版印刷開始印一些書籍、圖畫、碑帖、楹聯等。這時點石齋石印書局所購得的新式機器，是進步的輪轉石印機，轉動以人力手搖，每架八人，分作二班，輪流搖機。一人添紙，二人收紙，每次印製成品，每小時可得數百張。雖然手續麻煩，但比起光緒初年，最早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刷所使用是木製的石印架來說是進步多了。

到 1884 年時石印機已添購多部，等到光緒中葉時開始改用力引擎以代替人力，而印出數量也比前增加。

而這個時期的鉛印技術，常會因鉛字製作不易，在同樣字不多的情形下，一版中如果相同字太多時，就不得不借資於木刻字，但匆促添刻，往往字型不一或空白未刻，在木、鉛字夾雜下，印出品質難免會有字體大小不一、色澤深淺不一的情形。<sup>25</sup> 所以當時教會有鉛印書籍出版，被認為字體不雅又走油，當時申報館所印的報紙，就犯了這毛病。<sup>26</sup>

在鉛印與石印相較之下，石印技術比較簡便，不但可迅速的大量印刷，而且物美價廉，將之運用在插圖繪畫的印製上，尤其精緻美觀。因此，新式的石印版畫插圖，很快的便取代了舊式曠日費時的木刻版印插圖。<sup>27</sup> 在光緒年間迄民國初年，被大量使用來印製古籍、考試用書、通俗小說、畫報等，出版量豐富。

所以當時印書局石印比鉛印盛行，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的統計，光緒年間，在上海一地的石印書局有五十六家，鉛印書局則有二十家。<sup>28</sup>

字排印《袖珍本叢書》，實開此道風氣之先。中國舊有銅活字、木活字和泥活字排印之書，而以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百四十餘種最為著名。《申報》鉛字《聚珍版叢書》刊行於該報創刊之後不久，在西元 1895 年（清光緒 21 年）中昌書局繼承此業，其間刊行各書凡一百六十餘種，蔚為大觀，殆足與武英殿媲美。在西元 1877 年（光緒 3 年）曾有《申報館書目》一冊，著錄書籍五十四種；西元 1879 年（光緒 5 年）又印有《申報館書目》一冊，著錄六十四種。」

<sup>25</sup> 參考在淨雨：〈清代印刷史小紀〉，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 年），頁 356。

<sup>26</sup> 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之工業》，影印本（臺北市：學海出版社，民國 59 年），頁 110。

<sup>27</sup> 卓聖格：〈吳友如及其時事新聞插畫研究〉，《臺中商專學報》，25 期（民國 83 年），頁 757。

<sup>28</sup>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590。



當時《申報》館的附屬事業，除了點石齋印書局外，尚有申昌書畫室、古今圖書集成書局。原先這三個機構分工並不十分明確。大體上，申昌書畫室是利用《申報》館的鉛印設備，在印好報紙的餘剩時間，印刷市上流行的書本出售；點石齋書局則是石印印刷比較精良的圖書，畫頁畫冊等求售。後來印書事業逐漸擴大，遂各自獨立核算經營，但仍為《申報》的附屬事業。<sup>29</sup>

## 肆、點石齋印書局的出版品

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立，它主要業務是一方面承接印刷外界的來件；另一方面則搜集孤本、善本、珍本出版圖籍。<sup>30</sup>此節則探討它的出版品，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出版品的種類，一是出版品的行銷。因為新式印刷技術開展了印刷品的種類，除了過去的古籍圖書外，開始有畫報、字典、楹聯等的印刷出版。而過去傳統的書肆已無法滿足快速印刷的銷售，以寄存他省書店銷售，或刊登廣告的方式，增加更多的銷售量。而股印制則可降低印書局印製大部套書的成本及風險，此種銷售方式至今仍在沿用。以下則是探討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出版品種類及其銷售。

### 一、出版品的種類

從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約1878年），到合併為上海集成書店（1911年）止，這段時間石印局大量翻印或縮印了古籍；為了因應科舉考試之需求，有數量非常龐大的考試用書也利用石印術出版，如各種《大、小題文府》、《制策詩文選》、《經義詮解》等類的書籍應運而生。只是，這些書籍，隨著科舉考試的廢除，其實用性消失，失去了銷路，當然也沒有了留藏的價值。因此，流傳下來的並不多；而當時人有很多著作，也是使用石印術印製的，數量極為龐大；另外，利用石印繪製圖樣也遠較傳統刻版更為方便省事，而且效果很好，所以廣泛用於書中（尤其是通俗文學作品）的插圖或輿地圖書的繪製；至於報刊及畫報的出版則極

<sup>29</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316。另在王漢章：〈刊印總述〉一文中亦說：同治初年上海申報館附設之兩書店，一為專售鉛印書籍之申昌書室，一為專售石印書籍之點石齋，祇發行號稱申報館聚珍版零種小書，與定期刊物之畫報而已，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頁362。

<sup>30</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335。

為豐富，可說是石印出版品的另一大宗；此外也還有不少新學書籍的出版。<sup>31</sup>當時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出版品，其種類繁多，依徐載平等著的《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中統計自 1882 年至 1889 年《申報》所刊出開印的和出售的書目，共計有一百九十餘種。<sup>32</sup>由《點石齋畫報》書目廣告及現今國家圖書館<sup>33</sup>所收藏點石齋石印書局所出版的石印本來看，可以略分為下列幾種。

#### (一)楹聯、碑帖、墨寶、畫幅

點石齋初成立時，稱為「點石齋書畫室」，只是印一些楹聯、門聯、對聯之類的複製品，這類商品在當時是家家戶戶幾乎都會貼的大眾化印製品，而且價格不高，像對聯每副僅二角或二角五分。在 1878 年 12 月 30 日的《申報》中有「楹聯出售」啟事：

本館近從外洋購取照相字畫新式機器一付，於點石齋中延請名師監印，凡字之波折、畫之皴染，皆與原本不爽毫釐。茲先取古今名家法書楹聯，用電氣照於石上，然後以墨水印水入各箋，視之與濡毫染翰者無二。<sup>34</sup>

這是複製法書楹聯，是新式印刷機器最早的應用。後來開始印製中國的山水畫販售。畫幅與書法墨寶的成品，又分已裝裱與未裱背的，價格略有不同，如三尺花卉每張四角，已裱好的成品則另加三角五分，則售價是七角五分。

#### (二)考試用書

在科舉考試廢除以前，石印出版最多的就是各種考試用書，開始以印製書籍為主要項目後，名稱即由「點石齋書畫室」更名為「點石齋石印書局」。而點石齋真正有利可圖的也應是印製考試用書。

科舉未停前，一般知識分子唯一出路，就是經過縣考、府考、院考才能取得秀才的地位；得了秀才，又須經過鄉試，才能得到舉人。但因考試應用工具書籍多是木刻，卷帙浩繁，攜帶赴考，非常不便。自點石齋可縮印字體，印成可攜帶小書，讓參加科舉的人能隨身攜帶，所以「購買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趕考的舉人，年青目力好，他們不要寬邊大字，而喜歡旅行便於攜帶的小書，舉子們需要趕路，又喜歡帶書。<sup>35</sup>」，又有專為考生赴考挾帶之用的小書，縮至二寸多的八股文、試帖，一時之間為取功名的舉子，莫不爭先購買。

如光緒 11 年（1885）5 月 19 日《申報》廣告：

<sup>31</sup>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頁 69。

<sup>32</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334。

<sup>33</sup> 現國家圖書館所收點石齋石印本共 185 種，以光緒 14 年所印佔 175 種，光緒 31 年 4 種，光緒 22 年 2 種，光緒 6 年、13 年，9 年，20 年各一種。

<sup>34</sup> 《申報》，上海，1878 年 12 月 30 日（光緒 4 年 12 月初 7），頁 1 本館告白的「楹聯出售」。



精選石印大題文彙出售，坊刻大題文彙數千篇而止，罕有逾萬者，間有之而本數纍纍不便提攜，揣摩家每厭苦之。本齋於上年延名宿，將海內著名之刻文薈萃而精選之，務擇花樣斬新，最利場屋者，得文約一萬五千篇，分裝十二本，定價十元，現已躉數售出，欲購者請至上洋新北間外新昌泰及法馬路南申昌取閱可也，此佈。

在石印之前，這類考試用書最多只能收集數千篇，到了用石印縮小字體後，可收集上萬篇的文章，《大題文彙》就是此類書，它出版於光緒 11 年，集文約一萬五千篇，分裝十二冊，定價十元。

《經藝淵海》縮印本，經點石齋重加校勘改正後出版，定價是七元，其後並註明「不折不扣」。<sup>36</sup>

後來科舉改革，要考史鑑策論，於是《二十四史》、《九通》、《綱鑑》以及各種論說，又復盛行一時。<sup>37</sup>在王維泰的〈汴梁賣書記〉一文中描述考生在臨場前數日，搶購《周禮政要》的情形：「書係石印二小本，與原版迥別，售銀七錢，爭先恐後，櫃外隻手林舉，高聲索書，極似書院之點名搶卷者。問以究竟何用，皆莫能言其故，風潮所惑，正復不可思議哉！」<sup>38</sup>至於為何如此搶購此書，買書的人也不知其故，只是風潮所惑，真是不可思議！

石印翻印之古本，在科舉時代，如此頗得考生之歡迎。故於上海之外，武昌、蘇州、寧波、杭州、廣州等處亦相繼開設石印書局，以《萬年曆》或《致富全書》為開場印品。然其出品，則多不如上海之精美。<sup>39</sup>

雖然考試用書如此受到考生的喜愛，但相對的，在品質上也一直為學者所詬病。在講究考據、校勘的清代，對於新式印刷的石印本多所譏評，如《莊諧選錄》卷六中〈談石印書〉：

<sup>35</sup> 〈上海石印書業之發展〉，《北華捷報》，上海，1889年5月25日，取自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民國45年），頁1009。

<sup>36</sup> 光緒11年（1885）5月19日《申報》廣告：「縮本精選經藝淵海為吳下常安室主人，選定交本齋縮印，工峻已久，海內諸君咸來問訊，爭欲購致而主人……定價每部實洋七元，不折不扣，如有躉售者請至上海棋盤街福瀛書局面議，其餘三馬路及法馬路申昌書畫室並申昌號均有發售。」

<sup>37</sup>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9年），頁60。

<sup>38</sup>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405。

<sup>39</sup> 賀聖鼐：〈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收錄於《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9年），頁86。

近年石印書盛行，然業此者射利為主，貪縮小則書易售，遂至小如絲縷，因此傷目者多矣！又印書者多不校對，謬誤顛倒，貽害匪輕。余謂國家應定例：凡印書者，書中最小之字，以至四號為止，五六號字並禁不得用。又每書印出，應登報聲明，如有錯漏，準人知會，即行照改；凡校正脫漏顛倒者，每事酬費若干，校正誤字者，每字酬費若干；既定此例，則印書者自不敢忽略；必須依此二例，方許他人翻印。又凡石印，必須縮小及割裂，然他書可縮，而有關大小長短之程度者，必不可縮；他書可割裂，而表則不可割裂；今石印書於此二事皆忽略，殊可恨！<sup>40</sup>

對於在字體上，過小的字體被認為有傷目力；在內容上，校對不精，直接付印一般學者認為是，「印書者多不校對，謬誤顛倒，貽害匪輕」；而有些內文、表格不能分割的也分割；這也是看書人所不能忍受的。

《上海彙場景緻》中談到〈石印書籍〉：

自點石齋、同文局石印書局盛行於世，接踵而起者不下數十家。所印各種縮本，極為精巧簡便，惟嫌字跡過於細小，殊耗精神；蓋久視則眼花，若用顯微鏡，又易於頭眩，且難經久，為經書家所不取，是亦美中不足耳！<sup>41</sup>

在外形上，也是認為便於攜帶而縮小版本印製，字體過小，傷害目力。這種專為赴考場攜帶的考試用書，隨著科舉制度的結束而淘汰，似乎是必然的趨勢。

再加上清末以石印術出版的情況，其數量及速度之驚人，確非歷朝可比。這類書籍的價值，反映在售價上，亦可見出其身價不高。因此，這樣一股風潮，使得石印出版品，在傳統重視書籍的價值觀念下，被列為一種低劣的產品，始終難登大雅之堂，而石印本則是可以隨意棄置的東西。<sup>42</sup>在傳統藏書家物以稀為貴的心理下，石印本往往不被藏書家所青睞。

### （三）字典、字書

出版品中最著名的，而且也是真正開始大賣的，是從印製清張玉書等人奉康熙敕撰的《康熙字典》開始。原來木刻本的有數十冊，點石齋的石印《康熙字典》是將殿本分為三排縮印在一頁上，冊數減少，在當時是一種很新穎的版式。姚公鶴的《上海閒話》中說道：「聞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率購五六部，以成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即罄。<sup>43</sup>」，從此點石齋之名，遠近皆知。

<sup>40</sup> 〈中報書序〉，轉引自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91。

<sup>41</sup> 〈中報書序〉，轉引自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91。

<sup>42</sup>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頁109。

後來同文書局在光緒 16 年也出版過《康熙字典》，一直到民國 15 年，上海愛儷園廣倉學窘還出版了石印本的《康熙字典》，可見此書之被重視的程度。<sup>44</sup>而《康熙字典》售價，各種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字很小，……木版大字的售價自三元至十五元。<sup>45</sup>

點石齋於光緒 9 年出版了張玉書奉敕編的《佩文韻府》，目前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仍有收藏；光緒 12 年則出版了張廷玉等編的《駢字類編》。

#### (四)畫報

石印圖畫比過去木刻雕版大為便利，點石齋不特印書，又印圖畫，石印術最大的特色是圖的印製，所以圖書加上插畫，報紙加上新聞畫，成了點石齋的特色。對當時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人，有了插圖的輔助，要瞭解文意大概並不難；對於訊息的傳播，思想的宣傳，有著不可埋滅的功勞。所印製的有《歷代名媛圖說》及焦秉貞繪《耕織圖》等。而最出名的則是以期刊形式發行的《點石齋畫報》。

《點石齋畫報》創刊時間是在 1884 年 5 月 8 日（光緒 10 年 4 月 14 日），旬刊，隨《申報》附送，零售每冊洋價五分。每冊出圖八幀。版心長八吋，寬四吋六分半。封面用彩色本紙，圖畫則以連史紙石印。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藝編目，共出版三十六卷。直到 1898 年（光緒 24 年），才停刊。歷時十五年，前後共出圖四千多幅。<sup>46</sup>

它創刊的動機在《點石齋畫報》第一號中說：

畫報盛行泰西，蓋取各館新聞事蹟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sup>47</sup>

是受西方畫刊的影響，取特別的新聞事件，或新出器物，以繪圖方式，介紹給大眾。雖然它並不是中國第一本畫報，但卻是由中國人完全自己創作的的第一本石印畫報。<sup>48</sup>執筆畫家全為華人，畫風是中國傳統技巧，而且所畫大部分均有署名。《點石齋畫報》的畫家第一個為世人熟知的是吳友如。他原名嘉猷，又名猷。江蘇元和（今蘇州）人。生卒年不詳。除了吳友如外，尚其他的畫家如金桂、張志瀛、符節、何元俊、田英、馬子明、顧月洲、周權以及

<sup>43</sup>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2。

<sup>44</sup>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頁 73。

<sup>45</sup> 〈中國的石印業〉刊載於清光緒 15 年上海《北華捷報》，見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頁 1009。

<sup>46</sup> 卓聖格：〈吳友如及其時事新聞插畫研究〉，《臺中商專學報》，25 期（民國 83 年），頁 759。

<sup>47</sup> 《點石齋畫報》，第一號，光緒 10 年（1884 年）3 月（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年），頁 1。

<sup>48</sup> 最早的畫報是《瀛寰畫報》；在胡道靜著：《申報六十六年史》中說：「《瀛寰畫報》之圖畫是由英國畫師所繪，文字說明則為蔡爾康所作……。」

朱儒賢等。大抵以流寓上海謀生文士居多。<sup>49</sup>

點石齋除了這些畫家外，最初也收外來投稿的作品，在畫報初創刊時 1884 年 6 月報上刊登〈徵畫稿啟事〉，徵求零星的畫稿，一經錄用的作品，則有兩元的稿酬：

本齋印售畫報，月凡數次，業已盛行。惟外埠所有奇怪之事，除已登《申報》者外，未能繪入圖者，復指不勝屈。故本齋特告海內畫家，如遇本處可驚可喜之事，以潔白紙新鮮濃墨繪成畫幅，另紙書明事之原委。如果維妙維肖，足以列入畫報者，每幅酬資兩元。

《點石齋畫報》刊登了許多作品，其中新聞插畫之所以特別成功，在取材方面，先天即佔有極大的優勢，因為屬《申報》附屬事業之一，所以《點石齋畫報》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翔實的新聞內容；這包括了晚清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流傳的民間活動、以至市井瑣聞，展現當時社會的世態民情。

而《點石齋畫報》對於當時發生的很多時事，以及西方國家各式新奇事務等的描繪，藉由其廣大的發行網，迅速的將這些訊息傳送到讀者手中，在這樣的過程裡，有成千上萬的人很快的就接收到了新的資訊，也獲得了學習新的知識及接受新思想的可能，其影響可謂極廣且速。<sup>50</sup> 例如 1884 年 8 月至 10 月短短三個月中，吳友如先後畫了「基隆懲寇」、「基隆再捷」及「臺軍大捷」三幅作品，詳細報導法軍攻臺的幾次戰役。

在介紹西洋科技新知方面，《點石齋畫報》也扮演了一個重要且成功的媒介。如「水底行船」、「新樣氣球」兩幅作品，前者介紹可以入海的潛水艇；後者介紹當時天津武學堂所造成的飛行氣球，這氣球下繫籃子可以乘坐兩人。當時分批由海軍提督丁汝昌，盛軍總兵賈起勝等乘氣球升空。事在光緒 15 年間，為中國製造氣球之始。<sup>51</sup>

此外，介紹飛機的「天上行舟」，及上海商埠重大公共設施，在各處所設置會自動報時的時鐘「大自鳴鐘」等。在中國尚無新聞攝影及照相網版印刷技術，無法將照片印在報紙、書籍上，當時而言，這插畫就有如現在的新聞攝影在現場拍照，將記實的插畫傳遞給一般社會大眾。

點石齋石印局所出的畫刊，因以圖畫為主，而大大提高了民眾的閱讀興趣，也因而更能深入社會各階層，在當時便深受大眾的喜愛，對於知識的普及與傳播，有著深遠的影響。

由於圖畫表現精彩，受到極大的歡迎，是當時發行量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畫報。因為發

<sup>49</sup> 參考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 年），頁 234-236。

<sup>50</sup>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頁 103。

<sup>51</sup>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 年），頁 260。

行之後，廣受大眾的喜愛，銷路甚廣，而開始了石印畫報的風氣，反映政治時事、社會新聞的石印畫報，也陸續在上海開始出現，如光緒 16 年的《飛影閣畫報》，宣統元年《圖畫日報》等，開我國期刊畫報之先聲。<sup>52</sup>

#### (五)古籍圖書

在古籍方面，光緒 14 年出版的阮元《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史學叢書》、《文獻通考》、《古今圖書集成》、《儀禮章句》等等，這些幾乎都是以翻印古書為主，目前國家圖書館收光緒 14 年出版約一百七十五種的石印本。這些出版品有固定形式，仍是線裝書方式裝訂，紙張單面印刷，但書籍體積比原版尺寸小，但墨色清晰，即使極小字仍可清楚辨識，版權頁有出版年月，以篆體字印，如「光緒十四年二月上海點石齋石印」字樣。

當時的石印書局，因自己不編譯，專翻印古書，所以沒有甚麼編譯所的名稱。大概在發行所或印刷所另闢一室，專從事校閱。總校一人，一定要翰林或進士出身，月薪三十兩。分校若干人，舉人或秀才出身，月薪十兩左右。搜覓到一種書，經理決定要印，便照像落石，打清樣校對，校過便印訂，所以出書是很快的。<sup>53</sup>

點石齋石印局對於所印製書籍的取得，則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先在《申報》上刊登搜書啟事。徵求的書籍分兩類：1. 已完成但尚未刻印的著作；2. 已刻印但市面已罕見的稀有本，有重新刊印價值的書籍。而對於所徵求來的書籍，可以出價購買，或印成後送所印的書數十部或百部以為酬謝，至於所出價或送書數量的判定，以書是否容易販售為考量。刻成後原本仍歸原主。<sup>54</sup>

對於總校或分校曾經看過，有重刊印價值的書籍，也會在報上主動徵求，所以《申報》於光緒 5 年（1879）12 月 19 日刊出〈覓書〉啟事，找《人鏡陽秋》這本書，看啟事的內容應是新購得新式石版印刷機，特別適合印製圖畫，而《人鏡陽秋》這部書繪圖部分鈎勒精細。啟如下：

《人鏡陽秋》二十四卷，取古來忠臣孝子與夫節義之士，各繪一圖後附以小傳。向曾在友人處披閱，覺是書鈎勒精細，字跡也娟秀可愛，本館現擬用西國石印

<sup>52</sup> 許瀛鑑：《中國印刷史論叢》（臺北市：中國印刷學會出版社，1997 年），頁 360。

<sup>53</sup>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見張民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9 年），頁 63。

<sup>54</sup> 《申報》於 1878 年 3 月刊出〈搜書〉啟事：「啟者，本館以印刷各種書籍發售為常。如遠近君子，有已成未刻之著作，擬將問世，本館願出價購稿，代為排印。或裝訂好後，送書數十或百部申酬謝之意。總視書之易售與否而斟酌焉。如有罕見之本，宜于重刊者，本館亦可以價買。或送數十部新印之書，藉以報謝，至於原本，於刊成之後，仍可璧還也。」

法照成，以公同好。海內藏書家如有此書，乞即見示。俟印成後，酬以新書，或欲價售，亦可酌議也。

而徵求來的書，也有殘缺不全無法排印的情形，這時會再刊登啟事向各界搜集，看是否能得完整的版本，如《申報》曾於1879年12月21日刊出這樣的啟事：

搜訪《野叟曝言》多年，去年承友人寄示，惜中多殘缺，未便排印，故再出告白，遍行搜集。

希望能得全本後再翻印，因此對於當時殘本書有了補全的門徑。

在古籍整理方面，因為印刷叢書必須先纂輯舊本，整理古籍，挑選出精本，值得再印的，所以印成套的叢書，對於散失不全的叢書整理往往有間接助益。

但是在徵求古書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糾紛，有人向英租界工部局控告美查偷竊古籍書翻印，在1884年10月29日的《北華捷報》刊登〈記點石齋石印局偷書案〉，一個住在徽州的中國人有一部五千餘卷的海內孤本，原是先朝皇帝賜給他祖先的，結果被人偷出冒充茶葉運送到上海，賣給美查洋行，該行已打算在石印局印刷出版了。經查獲後是該行的僱員與捐客共同聯手犯下的案子。<sup>55</sup>如果沒有重利實在不會冒此風險，跑到徽州犯下此案，因此當時在點石齋石印局重利下，也確實印了不少的古籍，讓這些圖書得以流傳下來。

#### (六)其他

光緒23年，點石齋所出版的學習英文書籍及《時務通考》等，是因應當時維新思潮之下產生的出版物。

地圖方面，出版了一些中外地圖，目前在國家圖書館收有，光緒31年北洋洋務局纂輯的《江南安徽全圖》等。

點石齋石印局也出了不少圖說書籍，這些為了增加書籍的吸引力，讓人更易看得懂，對於所出版的書有些會自行加上插圖。這些圖書附畫頁，是由點石齋找繪圖的人自行加上的。在光緒10年（1884）6月，《申報》刊出〈招請名手繪圖〉啟事說：

本齋所得奇書數種，惟有說無圖，似欠全美，故特招聘精於繪事者，即照前報

所登尺寸繪成樣張，寄上海點石齋帳房，一經合用，當即面請至本齋面洽。

所招請的名手，是為配合圖書而加上插畫，如光緒10年（1884）出版的《鏡花緣》便增加了許多新圖。

而此處所招請的繪工應是專為圖書繪圖者，與《點石齋畫報》畫新聞畫者有別。與申昌

<sup>55</sup> 見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頁119-120。



書畫室所雇請畫工多人也不同，申昌書畫室的工作是專門替石印局添褐顏色，以便彩色石印。

## 二、出版品的行銷

傳統書坊圖書的流通，因囿於手抄及雕版印刷形式，出版量不大，書籍的販售除了少數老字號書坊有固定門市外，一些多是小商販於市集銷售；到了考期，書商們則提了考籃往各省、各碼頭，向趕赴考場的舉子們兜售《大題文府》一類的書本；或在考棚場屋設肆販售。

而舊書買賣則必須要親見看到書，才可談交易。因為同一書名，同一刻本，也會因印本有先後，紙張有寬狹的分別，而有不同的價格；故僅能與本地人當場交易，而決無外埠通信成交之理。如北京人想購上海某書店的書，非託上海友人代購不可。而各地書店，也閉關自守，各自為政。<sup>56</sup>

等新式印刷技術傳入後，傳統書業的經營無法維持原來的經營方式，故也改變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銷售方式。點石齋印書局挾其《申報》的媒體工具，其行銷方式比過去傳統的書坊來得更突出，它的行銷方式有：

### （一）刊登廣告

其為《申報》的關係機構，挾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利用報紙廣告售書，所刊登廣告都是刊於報紙首頁極明顯處。而售書廣告是每天刊登，內容不外有新印書成、減價出售的書籍、預約書的告知；如《申報》於光緒13年6月初7日所刊登，標題是〈淵鑑類函減價出售〉：

淵鑑類函一書臚采唐宋各家事類及子史稗編，凡日星河岳禮樂兵農暨道德性情禽魚草木，罔不辨析音義提挈綱領故能薈萃百家精詳博。書四百五十卷，誠類書之大觀也，本齋取初印殿版縮影。石彙訂十冊於癸未九月出書，其校核詳真縮印精工，久為海內士林所珍賞，適當大比之年，稽古家尤宜各置一編，以資考錢惟本齋存書無多，欲購者尚其捷足先登，勿步他人之後塵也可。每部洋十元，躉售發坊格外減讓，售處悉照往例。

廣告一開始多是介紹該書內容稀有珍貴，然後是言明書籍的卷數、售價，最後則是說明該書是減價出售，欲購者可以去經銷點購得。

<sup>56</sup> 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收錄於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428。

《申報》的銷售範圍，「到光緒 33 年（1907 年），在西南地區的桂林、東北地區的哈爾濱，被俄國占領的海參崴以及國外如日本、英國、法國等地亦先後設立分銷處，每天銷數從 1879 年的七、八千份增加到萬餘份。」<sup>57</sup>一萬多份的銷售量，對於售書廣告來說，也擴大了購書者的範圍，這遠非過去市集販售可以比擬的。

## （二）有代銷處及門市部

當時點石齋石印書局在上海有總局、有分局，總局設在上海商埠的南京路泥城橋堍；分局在商埠拋球場南首。成立以來，歷有擴張，在光緒 14、15 年間各省省城建立分莊達二十處。均命名「點石齋」。點石齋石印書局多開設在各省省會，同時多在貢院之前。當出自於精密籌計。因一來省會文人學士匯集之地，留心書報，必多購買閱讀。二則各省會舉行鄉試，必有各地貢生前來應考，到省即必順便購書。這應是出於市場經營的眼光。<sup>58</sup>

除了點石齋外，申昌書畫室也是其銷售書畫的地點，在光緒 13 年 3 月 19 日的《申報》報刊下即有點石齋代啟告示：

本館告白，杭城申昌書畫室為本館經售申報及鉛版石印等書，現遷在保佑坊大街石庫門內杭垣，諸君如欲購閱申報及鉛版石印等書，可就近認明價買，此佈。

而除了這些經銷處外，所印書籍委託其他書店代售也是其中的方法。如光緒 13 年 6 月初 7《申報》廣告：

精選石印大題文彙出售……欲購者請至上洋新北門外新昌泰及法馬路南申昌取閱可。

又如光緒 11 年 7 月 28 日《申報》廣告：

「石印文獻通考出售……欲購諸君祈早向南北申昌書畫室定購，並分寄上海掃葉書（山）坊、京都西河沿仁記洋藥舖，遲則恐將不及，以所印無多耳。此啟。」像以上所說的新昌泰、掃葉山房、京都西河沿仁記洋藥舖等，都有大量批發，供應到遠方的省份。

當時上海已用蒸汽機石印法印成中國著作有數百種，而石印局也有不少家，其所印的書銷行於全國，各地零售書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需要這種書籍。上海石印書局大量批發，供給遠方省份，北京琉璃廠也設有分店，尤其是在四川商業中心地重慶，其他各城市也有分店，如廣州等。但印刷中心地則仍在上海。<sup>59</sup>

<sup>57</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73。

<sup>58</sup>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1997 年），頁 278。



而書籍的運送遠方省分的方式是，數量少時，以小包從郵局寄達；多量書籍則得裝箱報關運輸。當時海關稅則是「值百抽五」的制度，但是以書籍為教育用品，為啟迪民智減輕讀書人負擔，所以是免稅的，而來往各地分銷處的書籍，也因此運輸不絕於水道。<sup>60</sup>

### (三)股印制

另一有特色的行銷方式是「股印」，股印即現在的預售。最先開始徵求「股印」的是光緒10年（1884年）的同文書局股印《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以啟示刊於《申報》。《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三百六十兩銀，先交一半一百八十兩，目錄印成後，繳所餘半價，取目錄及取書單三十二紙，以後印好隨出隨取，這是最早的圖書預售制。<sup>61</sup>

點石齋石印局也隨之效法，在光緒13年（1887年）3月19日《申報》刊登〈招股石印阮刻十三經注疏并校勘記〉啟事：

儀徵阮文達公巡撫江西時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書凡四百十六卷，後附文達自著校勘記度其版於南昌府學中，此書由元入明遞有修補……每部洋廿元可售，現擬招股開印，酌定每部洋銀十二元，願附股者先邀四元，檢與書條為憑，擇於四月底出書，書成再找八元取書，……。

《阮刻十三經》，共四百一十六卷，預計刊成後每部可售洋銀二十元，現招股開印每部售洋銀十二元，願先預約者先繳交四元，書印成後再付八元取書，對於刊印大部頭的書籍來說，可先視市場反應，再決定印製的套數，可以減少成本及風險，是非常有商業經營手法的印書方式，此種方式至今仍為出版所沿用。

## 伍、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衰落

點石齋興起於石印術傳入，但因科舉制度的結束，影響考試用書滯銷，讓印書局背負沈

<sup>59</sup> 參考〈中國的石印業〉刊載於清光緒15年上海《北華捷報》，見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頁1009。

<sup>60</sup> 參考平襟業：〈上海出版界瑣聞〉，《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科院，1986年），頁222。

<sup>61</sup> 光緒10年（1884年）〈股印古今圖書集成啟〉：「……去年曾經啟知，以招印一千五百股為額，並呈書樣四式，嗣蒙諸大雅示復，皆以字大行疏，每部三百六十兩為最，本局謹遵眾論，即照三百六十兩樣本開辦。凡來認股者，先交半價銀一百八十兩為定，一俟目錄告成之日，再登《申報》通知在股諸君來取目錄，即將所餘半價繳足，本局並發分次取書單三十二紙，以後各典續出，隨出隨取，俾臻兩便。目前股份尚未足數，如欲購是書者，尚祈及早惠臨，庶幾股額早滿，藏事亦速，是所厚望焉。」

重的滯銷問題；而新式印刷術不斷的傳入，突顯了原來石印技術不及之處的缺點，以石印起家的印書局不久遂被其他印刷技術取而代之。而此時點石齋石印書局更要面臨到報館易手，出版經營方向的改變，最後則是與《申報》附屬機構合併為「上海集成書店」，正式結束了「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名稱。以下則探討印書局衰落的原因。

## 一、科舉制度結束致出版品性質改變

光緒 31 年（1905 年），在中國行之千年的科舉考試結束，科舉的廢除不只是讓當時讀書人一時無所適從，就連考試用書也受之波及，地位從此一落千丈；整個教育制度也隨之改變，新式學校取代了舊式的書院，課程內容也大幅度的變動，過去的銷售最好的考試用書，在這種情形下，宛如廢紙一般，在陸費達的〈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中說道，清朝廢科舉，於是石印書一落千丈。考試的書原售一、二元的，此時一、二角無人要。大的石印書莊，因考試書的倒霉，都關門了，只剩幾家專印古書或小說的小石印書坊了。<sup>62</sup>這是整個石印業所面臨的困境。

但是點石齋石印局在面臨這個環境的衝擊時，顯然應變能力不夠，在科舉被廢前仍不相信科舉會停。在科舉考試廢除的前三年（1902），8 月，清政府頒布《學堂章程》，通令全國遍設新式學校，但《申報》在 9 月時，仍發表〈科舉不會遽停〉一文，不相信科舉制度會停考：

有客自白門試畢回滬，謁執筆人問：「子知科舉不久將廢乎？寧省垣傳者嘖嘖，僉謂大小考試已定於明年一律停止，故神態沮喪，深怨此次一試不售，永無自顯之時矣」。執筆人曰：「甚哉！人之言不足信也。夫科舉為掄才大典。中國近日仿行西法，特命各省設立大中小學堂，廣為造就，俟卒業依次升轉，分別予以出身。原以開辦之初，人才尚少，故與科舉并行悖。他日成才日眾，學堂所出之士，無不明顯於當時，然後將科舉徐議廢棄。顧必謂科舉不可得真禾，學堂能出奇士，則揆諸情理，恐未必然。誰謂科舉僅爭一日之短長，易開微幸成之漸，而學堂執有卒業之憑據，果然皆通達之士乎？果如所言，則是因噎廢食矣！我朝自開國迄今，其間將相聯翩，功業彪炳，其發跡之始，無不由科舉中來，一旦以設立學堂，遽薄

<sup>62</sup> 陸費達：〈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收錄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9 年），頁 63。

前人遺法為不足遵，非惟聖君賢相所不忍為，抑亦非樂育無方之道也。」<sup>63</sup>

在面對科舉存廢問題時，不相信「科舉不可得真禾，學堂能出奇士」的說法，仍對科舉抱持著不會廢除的信心。依賴印製考試用書的點石齋石印書局，此時缺乏對環境的應變能力，未能適時改變書局的經營方向。

反而在同時期的文明書局於光緒 30 年（1904）出版了許多中學教科書。同年的商務印書館夏瑞芳審時度勢，也決定以出版教科書為其中心業務，半年多時間，編輯出版了《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引起各校爭購，數月間風行全國，行銷十餘萬冊。<sup>64</sup>

點石齋石印局則是直到後來，才開始不得不印製教科書，這是隨著教育制度改變的必然現象，但比起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來說，腳步確實慢了許多。到了 1911 年點石齋併入「上海集成圖書公司」後，在 1911 年 9 月 20 日的《申報》上有一段刊登的啟示說：

本公司發行學部初、高等小學教科書及教授用書，再有部編中學用、師範用、女子師範用各科教科書五十餘種，亦歸本公司承印，不日出版，《申報》館售書處代售。

從此，《申報》館的附屬出版事業的服務方向，即由原來印刷大部頭書和科舉考試用的經典著作以及孤本珍版、小說等書籍，轉而出版教科書了。<sup>65</sup>這是由於西方教育思潮的傳入，新式教育所需的書籍，不再是傳統的蒙學書籍，代之而起的是更適於時代之需的教科書。因此，在清末民初，當時整個學制在逐漸改變的同時，新式教科書的編印也在同時進行中，而這些新式教科書的編印，是印書局為繼續生存下去必須走的經營路線。

## 二、新式印刷術的傳入

當時上海並無彩色石印，點石齋石印書局所印只是單色石印，多為黑色，間有赤、青、紫一色的。彩色石印者須送英國彩色石印局代印。但不久，富文閣、藻文書局的成立，上海開始有五彩石印，但稱為平色版，因色彩無深淺濃淡之分。

色彩有深淺濃淡之分的是較石版印刷技術來得更好的照相網版印刷，大約在十九世紀末也相繼傳入中國，然而晚清各地出版的報刊，受器材成本、製版印刷技術等條件的限制，雖然大都不會製作照相網目版，不能在報刊上直接發表攝影作品。但聘請外國技師指點，逐漸

<sup>63</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297。

<sup>64</sup> 賈平安：〈記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1982 年），頁 138-139。

<sup>65</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317。

掌握了照相網目製版術，某些書籍及報刊開始用照相網目版來刊印少量照版作插圖。

1902年戢元丞與日人下田歌子合資在上海開設「作新社」，專門譯著新學書籍，又有留學生多人在日本印成書籍，回國發行。這些書均屬鉛字，字體墨色均極精美，遠非當時上海各印書局所能企及。於是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公司等均起而效之，改用日本式鉛字。

光緒34年（1908年）時，商務印書館聘請日人木村今朝男指導鉛版印刷機的使用。這種鉛版印刷機以輕薄之鉛版，代替厚重的石版，用輪轉之理，增加速率，每小時能印出數量達一千五百張。<sup>66</sup>比起過去的石版印刷每小時數百張的印刷量來說明顯是進步多了。

這正是鉛字發達，石印蛻化時期。隨著印刷技術的改進，各種新式書局的成立，印刷品質上，也隨之進步了；印出數量上，從過去每小時數百張到每小時一千五百張；印刷機器來說，則由厚重的石版到輕薄的鉛版。

是時科舉已廢，紙張墨料又漸昂，石印書漸惡化，只剩下小學教科書則因楷字圖畫關係，仍多用石印。<sup>67</sup>

這段時期的點石齋反而正面臨成堆考試用書的滯銷，因此在這些新式印書局壓力下，點石齋沒跟上這波新式印刷潮流，已不復當時獨領風潮的局面。

### 三、申報館易手及書局的合併

美查兄弟倆在1889年收回本利後就回國，從此未過問《申報》之事。1889年時，公司是由董事四人管理，三位外國人，一位是中國籍的梁金池。這時《申報》館相關企業是由外國人全部掌握而轉入華洋合股時期，這時間從1889年到1909年。1909年則正式將《申報》館企業全部出售與國人席子佩。<sup>68</sup>

席子眉、子佩，弟兄兩人，先後都作過申報館的買辦。席子佩於他兄長子眉亡故（光緒23年）以後，把子眉生前所手創的點石齋石印書局等事業，從他寡嫂手裡侵佔過去。而席子佩的姪兒席仰高一直就跟隨席子眉做事，是他幫席子眉經營點石齋石印書局，而擔任經理一職，後又跟隨席子眉進入申報館，負責營業經理的全部事宜。<sup>69</sup>

<sup>66</sup> 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之工業》，影印本（臺北市：學海出版社，民國59年），頁110。

<sup>67</sup> 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之工業》，影印本（臺北市：學海出版社，民國59年），頁110。

<sup>68</sup> 參考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21。

<sup>69</sup> 參考胡慈珠：〈史量才與上海申報（六）〉，《傳記文學》，第66卷第3期（民國84年3月），頁119。

在光緒31年（1905年）時雖仍是華洋合股時期，但事實上席子佩已將《申報》全部產業接收過來，獨立主持辦理。但直延遲到宣統元年5月30日，方始由美查有限公司代表阿白（為葡萄牙人，原名 E. O. Arbuthnot）先生，與席子佩簽訂轉讓的契約文件。仍以阿白先生任為《申報》出面經理，此為當時環境和形勢關係，非此不可，而實際主權已歸華人席子佩所有了。<sup>70</sup>

1889年美查回國後，席子佩經營這段時間，在《申報》上徵求孤本珍版，出售書籍的啟事就不常見了。可知這個時期因經營易手，經營方式也明顯與過去不同。

到1911年間，席子佩即把「申昌書局」、「點石齋書局」、「古今圖書印書局」等合併成為「上海集成圖書公司」<sup>71</sup>，點石齋石印書局隨著書局的合併，正式走入歷史。

## 陸、結 論

點石齋石印書局歷時三十多年，在當時對整個文化出版事業來說，有著開拓的貢獻。大致來說，可從三方面來看：一是讓許多古籍藉著石印出版得以整理流傳下來；二是圖書出版品得以普及化；三是間接促使了出版業的蓬勃發展。

在過去靠著手抄與刻版印刷時代，圖書異常珍貴，書籍的保存有賴官府收藏與私人藏書家。從收藏範圍來看，官府基於政治上考量，有些書籍列為禁書，有些又被視為政治上考量大量印製；而私家藏書則與官府藏書不同，有許多私家藏書者本身即是版本學家或著述學者，所收藏很多是蒐購精本，或自己的手抄本；所以他們藏書的範圍與官府所藏的書不甚相同。但是這些藏書流傳不廣，且往往因為兵燹，<sup>72</sup>或因為家道中落，<sup>73</sup>以致官府或私家藏書遺佚情形非常普遍。但前面所說點石齋石印局的「搜書」、「覓書」這些工作，對於古籍圖書的整理流傳有莫大助益。

二就圖書出版品普及化來看，在清代所重視的考證學、版本學，在石印本書籍大量印製後，瀕臨衰退。因為石印本的特點是忠實地呈現書原始的風貌，章太炎曾說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我平生專讀石印本的書」，<sup>74</sup>如果書籍原本有真偽、殘缺、錯字之爭，印書館也

<sup>70</sup> 胡慈珠：〈史量才與上海申報（二）〉，《傳記文學》，第65卷第5期，頁118。

<sup>71</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317。

<sup>72</sup> 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頁181：「時值太平軍規復江南，吳中藏書盡散，……」。

<sup>73</sup> 清代上海藏書家李筠嘉，藏書至四千七百餘種，喬重禧輓筠嘉詩注：「君身後藏書盡散」。

不該自行校正修改，應保持最原始的版本狀況。

而讓圖書普及化的關鍵有二：一是製版快速，圖書價格較以往便宜許多，讓一般讀書人負擔的起。在《蕘圃藏書題識札記》中所記乾嘉年間的收書價錢，如：

「宋刊本溫國司馬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嘉慶二年夏，學餘堂書肆索白金一百六十兩，余以價昂還之。」「宋本王右丞集十卷，價一百二十兩」「嘉慶九年冬以二百四十金自周香嚴家買得宋刊殘本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卷」<sup>75</sup>

這固然是宋本精版書價昂，但藏書家以藝術品收藏，一般讀書人如果沒有錢是連抄本也看不到，當時抄書價格是：

紙每百葉約八十文，鈔資十倍之。不過要請名手，一葉就要一千二百餘文，或每百字二十二文。<sup>76</sup>

而石印書籍的價格比起以往來說是便宜許多，如《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售價是洋銀十二元；<sup>77</sup>《淵鑑類函》十冊，售價每部洋十元。而又能幾乎與真本一樣，對於舊式學者來說，除了面臨新學的東進外，所擁有珍藏的典籍，也因大量複製而無法閉門自珍了。

又如清代江南河道總督麟慶所著生平遊歷的《鴻雪因緣圖記》，附圖二百四十幅，麟慶只印「數十百部」贈人，流出市面後書價高達數十兩銀，但 1879 年點石齋石印五千部，售價僅一元，不到一年便已售完，於是第二年再度重印，其書更為普及。<sup>78</sup>

另一關鍵是圖畫的印製。石印圖畫比過去雕版木刻大為便利，點石齋不特印書，又印圖畫，所以圖書加上插畫，報紙加上新聞畫，成了點石齋的特色。這種通俗大眾讀物，對當時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市井小民來說，有了插圖的輔助，要瞭解文意大概並不難；對於訊息的傳播，思想的宣傳，有著不可埋滅的功勞。

三是間接促進出版業的蓬勃。點石齋既獲厚利，因此刺激了其他出版商的仿效，以其製版快速，印刷便利，價格低廉的優勢，大量翻印古籍，獲利頗豐；不但使書籍普及化，讓一

<sup>74</sup> 轉引自屈萬里：〈讀古書為什麼要講究版本〉，《大陸雜誌》，第 2 卷 7 期（民國 40 年 4 月），頁 15。

<sup>75</sup> 轉引自喬衍琯：〈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大陸雜誌》，第 27 卷 11 期（民國 52 年 12 月），頁 12-15。

<sup>76</sup> 喬衍琯：〈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頁 17。

<sup>77</sup> 宋杰：《中國貨幣發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9 年），頁 252 中有說道銀兩、銅錢與銀元的比價：「銀兩和銅錢的比價根據市場情況的變化有漲有落，但起初是一兩白銀換一千文銅錢的比價，一枚銀元在市場上幾與紋銀一兩等價。」

<sup>78</sup>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學生書局，2000 年），頁 290。



般人也能擁有藏書；更吸引其業者紛紛效法，開設了不少的石印書局，此時石印術的運用達到了頂點，甚至一度還造成印刷紙張的缺乏；而傳統的書業也無法再維持原來的方式經營。

除了因獲厚利外，與其在上海地理位置也有莫大的關係，當時的上海取代北京成為近代出版業的重心。上海因有租界地，清政府對於此地的出版無法管轄，<sup>79</sup>所以上海的出版事業在清末會比其他地區來得昌明。其中新創設的新式書業有同文書局與蜚英館。當時盛況是由點石齋、同文書局、拜石山房三者鼎足而立，在黃協埙的《淞南夢影錄》中有說道：

英人所設點石齋，獨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近則甯人之拜石山房，粵人之同文書局，與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也！

這些石印書局的崛起，與點石齋的成功，不無關連。如光緒7年（1881）所創設的同文書局，是由粵人徐鴻甫所創辦，就是因看到點石齋的獲利很好，於是購置石印機十二架，雇用職工五百人，專門翻印善本書，它的發展規模也遠超過點石齋石印書局，出版了很多大部頭的書籍，如《二十四史》、《康熙字典》等。<sup>80</sup>

另後來居上的是蜚英館，其創設規模更大，為李盛鐸創辦，他是清末有名的藏書家，他所創設的蜚英館以石印科舉考試用的書籍為主，購置印書機十幾部，並設置總帳房、會客廳、總校處、繪圖處、裱書處、畫格處、描字處、照片房、火輪印機房、印稿房、校書房、磨石處、積書處、堆紙處、裝訂處等等，在當時應是規模很大的印書館。<sup>81</sup>

舊式書坊改型成功的有掃葉山房。<sup>82</sup>在清末石印書籍風潮初起之際，掃葉山房也是其中

<sup>79</sup> 當時《大清律例》中有：「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動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斬監候。」在清代，極少有人敢斥資辦民營報章，即使有人要經辦報業，也要以外國人登記，託跡於租界。

<sup>80</sup> 賀聖鼐：〈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見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頁270，中有說道「同文書局」的創設：「書商見其（指點石齋石印書局）獲利之鉅且易，於是光緒七年粵人徐裕子（鴻復）有同文書局之設，購置石印機十二架，雇用職工五百名，專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齋書畫譜等書，尤其著者。」。

<sup>81</sup> 在1887年（光緒13年）正月13日的《申報》中即說：「石印書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贊嘆。既甯、粵各商倣效其法，爭相開設。而新印各書無不鉤心鬥角，各炫所長，大都字跡雖細若蠶絲，無不明同厚理。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近又有殷商某君（即李盛鐸）出資甚鉅，向外洋購定印書火輪機十數張，擇定英會審署前朝北舊房數十幢，不日興工重新改造，屋峻牆高，一如西式，額曰蜚英館。內擬建東西互對房若干幢，分設總帳房、會客廳、總校處、繪圖處、裱書處、畫格處、描字處，以及照相房、火輪印機房、印稿房、校書房、磨石處、積書處、堆紙處、裝訂處，門分戶別，井井有條。今已延訂各項熟悉之人，預備督率各司，一俟佈置完全，即須開辦。先印大部要書數種，必須善期盡善，精益求精，駕乎諸家之上。其餘各種祕笈待印者，何止數百部，均須次第付石。其屋已飭匠碩繪定圖樣，限期從速起工，早日完成。行見鏡石磨來，眼賞蠅頭之字；金錢飛去，汗堆牛背之書矣，嘻，盛矣！」。

<sup>82</sup> 掃葉山房的歷史頗為悠久，明朝萬曆年間蘇州洞庭山的席氏就已經在蘇州閭門內開設了掃葉山房，到民國初年已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清末，掃葉山房由蘇州往上海發展，咸豐年間，在上海彩衣街設立分

非常重要的一員，它不只是歷史悠久的老店，更是出版石印書籍的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一家老店，據〈掃葉山房發行石印精本書籍目錄〉整理到民國 12 年時，出版石印書籍已經有四百二十種，到民國 22 年該店書目刊載，出書則已經高達二千餘種，數量實在非常驚人；一直堅持到民國 44 年（1955 年），才因為書籍的銷售不好，經營上出現問題而倒閉。

除了上述的同文書局、蜚英館和掃葉山房外，像光緒 23 年（1897 年）創立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於光緒 28 年成立編譯所，致力新式教科書及工具書的編輯，及西文書的翻譯，加上它積極引進改良印刷技術、機器設備，一直迄立於今，更是為中國近代印刷史上重要的出版社。

點石齋石印書局對整個中國近代出版業來說，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它使得新式書業開始紛紛成立；舊式書坊也被迫改型。

但也因為其所印的書籍，一般商品化、大眾化的結果，而使得過去講求文化藝術雕版的學者，對此種石印品缺乏學術上的認同。再加上在新式印刷技術與新出版社的壓力下，石印局經重整合併後，點石齋石印書局於 1911 年結束；而此股石印風一直持續到民國二、三十年間，仍有不少新舊出版社都還是陸陸續續出版石印書籍，像掃葉山房、商務印書館等，但此時出版品已逐漸為新式鉛字印刷取而代之，石印佔出版品比例已非常少了；石印本出版品的風光此時已經結束，點石齋石印書局也正式走入歷史，而這三十多年的風光歲月，為它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

號，之後，又在棋盤街設立北號，隨著書店業務的發展，最後，棋盤街的掃葉山房北號遂成為總店。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清)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市：食貨出版社，民國66年。
- 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之工業》，影印本。臺北市：學海出版社，民國59年。
- 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翻印版。臺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77年。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44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12月。
-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年。
- 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 宋杰，《中國貨幣發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9年。
- 吳友如主編，《點石齋畫報》。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高俊茂編著，《美工廣告印刷概要》。臺北市：星狐出版社，民國79年。
-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翻印版。臺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68年。
-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4月。
- 許瀛鑑，《中國印刷史論叢》。臺北市：中國印刷學會出版社，1997年。
- 張民等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9年。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張憲文，《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
- 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 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85年。
-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學生書局，2000年。

## (二)論文、報紙

平襟業，〈上海出版界瑣聞〉，《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科院，1986年。

李占領，〈西學輸入與中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市：中國書籍，1990年。

屈萬里，〈讀古書為什麼要講究版本〉，《大陸雜誌》，第2卷7期（民國40年4月）。

卓聖格，〈吳友如及其時事新聞插畫研究〉，《臺中商專學報》，25期（民國83年）。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淡江大學中文系民國86年碩士論文。

胡愍珠，〈史量才與上海申報〉(一)至(廿三)，《傳記文學》，第65卷第4期至第69卷第3卷（民國83年10月至民85年9月）。

張秀民，〈石印術道光時即已傳入我國說〉，《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市：印刷工業社出版（1988年）。

陳平原，〈以圖像為中心——關於《點石齋畫報》〉，《二十一世紀》，第59期（2000年6月）。

賈平安，〈記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葉再生，〈概論馬禮遜的中國語文字典、中國最早一家現代化出版社和中國近代出版史分期問題〉，《出版史研究》，第1輯。北京市：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

喬衍琯，〈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大陸雜誌》，第27卷11期（民國52年12月）。

繆子彬，〈近百年的刻書與藏書〉，《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科院，1986年。

向迪琮，〈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報及其繼起者〉，《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科院，1986年。

蘇精，〈中文石印（一八二五～一八七三）〉，《書目季刊》，第29卷第3期，（民國84年）。

《申報》，1878至1879年，1885至1887年。